

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

Josefina Santos, S.P.C. 著

馮彩華譯

1. 修會的起源

一六九三年，法國經歷了一場浩大的饑荒，不幸而死去的人高達二百萬。就在此時，一六九四年，一位年約三十歲的年青神父，抵達樂維威村·迺桑里堂區（Levesville La Chenard）。這條小村位於沙爾德（Chartres）東南約十五里，人口不超過一百五十人。沙路易神父（Fr. Louis Chauvet）對基督的福音懷著深切的熱愛，更深受聖保祿的說話所催迫：「對一切人，我就成為一切，為的是總要救些人。」（格前 9:22）沙神父立即展開行動，決心要把他窮苦的教友，從貧窮的禍害中救出，更重要的，是要幫助他們脫離無知。他深知這不是他個人能力所及，必須別人的幫忙。

沙神父尋找的是善良、充滿宗教熱忱的女性，不管來自什麼階層，也不計是貧或富。她們只需天賦勤勞，因為她們將誓許委身基督，追隨祂仁愛的榜樣，以探訪窮人、病弱及教育小孩為她們唯一的生活理想。¹

很快地，兩位年青的女子及一位女士，雀躍地表示願意跟隨沙神父，把她們的生命奉獻給天主，為服役人群，特別是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她們都非常慷慨、勇敢和無私。最初，她們都住在家中，直至一七〇〇年，沙神父在鄰近聖堂為她們所蓋的房子落成。沙神父更為她們定下了簡單的會規，並揀選了十七歲的瑪

¹ Rene Gobillot, *The Sisters of Saint Paul of Chartres*, trans (Manila: 1956), p. 5

麗·米素 (Marie Micheau) 爲院長。² 村中一位熱忱的貴族女士迪瑪利·安娜 (Marie Anne de Tilly) 協助他。沙神父指導她們的神修生活，培育她們，引領她們開始她們的使命：教育無知的村童、探訪村民及病弱者。

沙神父起初的意願是組成一宗教團體，他所關懷的是他堂區內貧窮的教友。但在天主奧祕的眷顧下，沒想到這弱小的團體成爲了一顆種子，且茁壯成長爲一棵大樹。

一七〇八年，這被稱爲「樂維威學校的女兒」(Daughters of the School of Levesville) 的新生團體，已向週遭的村落發展。沙爾德 (Chartres) 的保祿·葛德·馬列主教 (Mgr Paul Godet des Marais) 也在這時接管了她們，並把自己的名字給予她們，把她們正式命名爲「聖保祿修女」(Sisters of St. Paul)。這也真是上主意願的顯示，清晰地指出修會將來的發展方向，就是如聖保祿一樣，成爲傳教士，即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。

2. 踏足香港

一八四六年，巴黎外方傳教會 (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) 會士狄奧多·奧斯定·科嘉神父 (Fr Theodore-Augustin Forcade)，被委任爲日本宗座代牧 (Vicar Apostolic)。在等待日本開放門戶給外籍傳教士進入時，一八四七年十月，科嘉主教再被委任爲香港宗座代監牧 (Pro-Prefect Apostolic)。其後他返回巴黎，心中卻縈牽著他那新的使命。香港需要修女的幫助，他決

² 狄路易神父，根據他的扎記，《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歷史的起源》，中譯本 (1986)，頁 115。

定不會獨自回去。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，他寫信給與他最熟悉的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，他的妹妹更是那修會的修女。

如所週知，香港島距離廣州只有數哩之遙，目前香港居民，除了管理政府的英人之外，還有華人以及來自淪陷城市澳門的葡籍移民的後裔。駐守香港的愛爾蘭官兵，幾乎全是教友。在華人方面，至少已有一個教友的小團體，而且大有與日俱增之勢，只希望它能夠在三數年間大事擴展。

愛爾蘭的官兵醫院，正需要有修女協助管理。官兵的女兒也很需要修女辦學施教…修女的學校成立以後，可以收容澳門的葡萄牙女童…。

最後，目前有一間以前成立的醫院，正在照顧從街上拾回來的華人棄嬰…都急需修女的幫助。

還有，愚見認為，香港甚至需要有修女以其修會的幫助來訓練華人青年，好使他們日後能夠承擔管理醫院和學校的責任，為同胞服務。³

回應是迅速的。被派遣的修女數目雖未能達到他的要求，但也能暫時應付目前的工作。

3. 香港的傳教工作

科嘉主教帶著四位傳教士回到香港，她們是：奧古斯·嘉萊修女（Sr Auguste Gallois）、佳播·祖賓修女（Sr Gabrielle Joubin）、雷絲·莫斯修女（Sr Louise Morse）——她是一位英籍的歸依者，最後是主教的親妹妹雅芳善（Sr Alphonsine）修女，

³ Jean Vaudon, *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*, 《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一八四八年 - 一九二六年》，中譯本（香港：1980），頁 2。

她從傳教地瓜德羅普（Guadaloupe）被召回，且被任命為院長。歷經四個月海上的危險旅程，她們最終於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踏足香港的海岸。

那時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才剛七年，不但居住的衛生環境惡劣，且貧瘠得很，甚麼也缺乏。修女們初被安頓在灣仔（Wanchai）山邊一「茅寮」，這地點在前天主教墳場外，也是政府發給天主教會的第二塊地，第一塊在中區。七個月後，在同區靠近堂區的地方，為修女們找到較佳的居處。

香港的天氣及居住環境，與法國的有著很大的分別，首批抵港的修女生活艱苦，沉重的工作及壓力使修女們的健康響起了警鐘。兩年後，飽受工作疲累的雅芳善·科嘉修女（Sr Alphonsine Forcade），於一八五〇年十月，竟罹患腦炎而去世，享年只三十七歲。她悲哀的兄長科嘉主教稱她為「愛德的殉道者」。然而，好像這祭獻還未足夠，芳齡只有三十三歲的佳播·祖賓修女，也於三星期後相繼去世。第一粒種子已被撒播在香港這片土地上，猶如將茁壯成為大樹的麥子。雅芳善修女及佳播修女為天主及中國人民獻出了她們的生命，無可置疑地，她們的生命必孕育出新生命！

兩位初期傳教修女的去世，對在香港的傳教工作打擊很大，卻未能減退修女們勇往直前的心。幸好，在沙爾德的長上們已準備給予增援，同年三月，三位修女抵達香港，其中一位是聖瑪素修女（Sr Ste Marcelle），她代替雅芳善修女，成為新院長。

3.1 拯救棄嬰

來自法國的首批修女，於一八四八年抵港後不久，便發現最刻不容緩的工作，是拯救和撫養被遺棄的嬰兒，且主要是女嬰。在那時的中國社會裡——包括香港，遺棄嬰兒，視他們不配祖先的名字，或是家庭的負累，是普遍及被接受的習俗。尤其是女嬰，她們被當作貨物般看待，可被棄掉、售賣、遺棄，亦可被拾起撫養，待長大後再賣給富裕人家作妹仔（mui tsai）或妾侍。更壞的是，大部份的女棄嬰常被收集並賣到妓院，價錢則視乎年齡及健康狀況而定，綁架或監禁女孩子也是常見的事。這些悲慘境況驅使修女們立即展開拯救棄嬰的行動，盡量把他們從惡運中救出。一位修女寫信給沙爾德的一位女恩主，講述她如何因這些可怕的行为而感到沮喪。

如今，我們可以這筆款項去購買一些年齡較大的女孩子了，她們的價錢較高，我們往往需多付數塊錢，這遠遠超越聖童之家的經濟能力。最使我們難受的，是深知大部份較年長的女孩子，將被賣到沒有信仰的人手中，而越是漂亮和健康的，更會被交到鴇母的手中。啊！但願我們有足夠的金錢，把她們全部買過來！

她雄偉的心渴望拯救的，不是數名，而是全部的女孩子！

面對販賣人口的邪惡陋習，在沒有法律保障這些不幸的兒童及少年的情況下，修女們開創的孤兒院，也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。香港政府還要花費多年才定出律例，制訂妹仔陋習為不合法。

修女抵港後不足一個月，便開始收納第一名棄嬰，那是隨後數千名可憐棄嬰的首名，修女把他們從孤苦無窮，甚而面對死亡的命運中拯救出來。當修女收養，甚而購買棄嬰的消息傳開後，

很快地，很多華籍基督徒也來參與這救靈的工作，而另一些人則為購買棄嬰的金錢所吸引，把棄嬰帶到修女面前。

修女的工作，經濟上是受到聖童之家機構的支援，那是法國主教嘉祿·霍賓·鄭信（Charles de Forbin Janson）於一八四三年為天主教兒童而創立的機構，中國無數幼小受害者的哭聲及悲慘命運，使主教深受感動。他向法國的兒童呼籲，提議他們每月為援助中國兒童而祈禱，並作少許捐獻，他的呼籲受到熱烈的歡迎。這個獨特的「讓兒童幫助兒童」的構思，發展至整個世界，也使修女得以拯救數千兒童脫離悲苦，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失落天堂。為表示對這機構的感謝，修女在香港的第一個機構也以此為名——「聖童之家」（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- Home of the Holy Childhood）。

修女的工作不斷增多，需要的經濟支援也越大。修女開始教授法文、售賣物品、籌款及出售孤兒的針織手工藝品等，以增加收入。

一八四九年末，修女共接收了二百二十六個兒童，他們大部份的狀況很壞，死亡率很高。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五年間，平均死亡率是百分之六十八，而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五年間，死亡率更增至百分之九十四。

雖然大部份的兒童都死亡，能夠生還的，修女都給予他們終生的照顧，「由搖籃至墳墓」，修女細心教養他們。由於感到工作量超越了她們的能力，修女組織了一支由教友組成的支援隊伍——「十字架的愛護者」（Lovers of the Cross）。這些華籍貞女

穿著特定的服飾，她們多來自香港及中國內陸良好的天主教家庭。⁴ 修女又聘用奶媽來照顧年幼的嬰兒。

當她們所照顧的兒童成長至適合的年齡時，傳教司鐸為她們物色對象，安排她們與天主教的男青年成婚。司鐸首先接觸聖童之家，而修女們再以她們的條件，篩選未來的新郎，看看是否適合一理想的結婚伴侶。他的年齡必須是二十至三十歲之間，不可超過三十歲，必要是熱誠的天主教徒及品格良好，且經濟充裕，有足夠的能力照顧一個家庭。

3.2 教育使命

修會起源的神恩是教育無知者，修女忠於這個精神，對她們所收養的兒童，不單提供住宿、衣物及日常所需，更籌畫他們的將來。相信修女於一八五一年左右，當她們已遷至靠近海旁較大的建築物時，已開始為孤兒們提供教育的服務。

開始時，修女教導他們基本的讀寫能力、計算，當然還有宗教培育，後來更教導他們謀生的技能。起初，他們學習縫紉，為自己做衣裳；能力較高的，修女教導他們製造通花花邊、編織麻紗、刺繡等。當那些英國的女士們看到女童所製作的精美物品時，便立即訂購，這為聖童之家增添收入。

當修女於一八四八年抵港時，已有三所由監牧區開辦，專為中國男、女兒童的小型學校，⁵ 但仍沒有為外籍兒童而設的學校。天主教家長憂慮他們子女未來的教育，懇求司鐸們，司鐸轉而催促修女為他們開辦學校。

⁴ Gobillot, pp83-84

⁵ Sergio Ticozzi, *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*, (Hong Kong: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, 1997), p. 21.

首批由法國來港的傳教修女中，其中一位是英國修女——雷絲·莫斯修女。在一八五〇年第一位院長逝世，及一八五六年第二位院長返回法國時，她便當上第三位院長。那年終結前，雷絲修女開設了一班級，取錄了十四名兒童，一八五七年五月時，已增加至二十四名。她這樣向沙爾德的長上們述說當時的情況：

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。那些意大利司鐸們已不能再忍耐了…，天主教的家長們認為修女抵港已有很長的時間，仍未能開班教學，對此感到很憤怒…。每天我與另一位修女前往，在不同的部門教授數小時。我們這兒沒有地方，而路途遙遠，不適合小朋友來往，所以我們不能在這兒教授…。

由於聖童之家沒有空間，莫修女有五個月之久，在附近租賃了一層樓房。

雷絲修女體力日漸衰退，於一八五九年返回法國，自此，這首次為女童開辦學校的嘗試也因而被擱淺。十七年後，一八七六年，保祿·十字·庇雅姆姆（Mother Paul de la Croix Biard）再次開辦一班級，取錄了十二名歐籍兒童。⁶ 無論是為孤兒或學生，或所做的任何事情，修女的目標，顯然不單只限於這個世界。一九一〇年出版的章程，清楚地列明這目的：「傳授給學生的…不單是良好的基礎教育，更要能使她們獲得永生。」⁷

位於灣仔的學校，距離維多利亞市（Victoria City）中心，仍算是「遙遠」。開埠初期，在城中行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；在平地走，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，往山上走則要靠轎子了。高主

⁶ Bord, Paul, *Mothe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*, trans. (np: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), p. 101.

⁷ *Hong Kong: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* (Chateaudun: Societe Francaise de Phototypie, 1910), p.43.

教（Bishop Raimondi）准許修女收納寄宿學生，但不得超過十二人；這禁制令於一八九五年為和主教所免除。

學校於一九〇二年轉為一補助學校，不斷努力提昇教學水準。一九一〇年底雅斯·羅柏修女（Sr Beatrice Roberts）抵港，她被任命為校長，隨而帶給學校一很大的推動力。她非常能幹，才能超卓，不斷精益求精，她務求學校達到優異的品質，提供優質教育；至今，學校仍保持著這質素。

學校的法文部於一九二六年關閉，但法文仍被保留為一科目，其他科目有音樂、美術、繪畫、縫紉、打字及速記。一九三七年庇雅斯修女被調往菲律賓，兩年後返回香港，出任香港大學聖母女子宿舍（Our Lady's Hall）舍監。

3.3 「喜樂之家」

修女的仁愛工作逐漸延伸至援助人類不同的困苦及需要。孤兒院也酌量收容傷殘的人士，她們在聖童之家內另立一部門，稱為「仁濟之所」（Almshouse），在那兒給予他們特殊的培訓，並教授他們學習一些技能，聾啞的人學習以一套香港特有的手語彼此溝通。修女教授他們縫紉，但更多的時間，他們從事家務，及協助修女照顧年幼的兒童。

一八九四年，爆發了一場厲害的瘟疫，很多人變得一貧如洗，棄嬰的數目也驟然增加。不管怎樣，修女照顧的，不單是兒童；在這次流行疫症中，老年人也深受其害。

一天，一位年老的病婦，聽別人述說修女有無盡的愛，心血來潮地跑到法國修院的聖童之家，單懇求一件事：就是「能進入喜樂之家」。房舍的空間已很狹隘，更重要的是已接收了大量的兒童，這些理由，足以驅使

修女拒絕接收這位病婦；然而，院長修女好像只聽到仁愛之聲，「喜樂之家」（House of Happiness）的門，也隨之為這位病婦而打開。

很快地，更多的人跑來懇求收容，他們也受到同樣的歡迎。因此，隨著天主的指引，藉著修女不忍拒絕的心，一項新的愛德工作——照顧長者，便展開了。事實上，這項工作促成了另一項更龐大、要求更高，但也更長久的宗徒工作。

天主的旨意很快便顯而易見，修女需要開始一項新的服務。一八九四年，爆發了極具破壞性的淋巴腺鼠疫，修女即時作出反應，在毫無計畫下，開始了現有「聖保祿醫院」（St. Paul's Hospital）的工作。在灣仔這個「庇護之城」（City of Refuge），已收容了很多居留者：棄嬰、孤兒、盲的、聾啞的、跛的及老弱的。他們很多都需要醫療及藥物的供應，建立一所醫院應是天主的旨意。聖童之家的空間已到了極限，接替保祿姆姆的菲力斯·佐頓姆姆，不用多想便提出建立一所醫院的請求。這所醫院在兩年後完成，於一八九八年一月一日正式開幕，也就是人所通稱的「法國醫院」（French Hospital）。

院舍頂層曾被「美國聖母升天女修會」（American Assumption Sisters）作避難之所，她們因美國及菲律賓大戰而逃離菲律賓。首三層則為仁濟之所及「育嬰院」（Crèche / nursery），有三十六名老婦人居住，後更增至超過六十人，另有一間大房專為收容貧苦的兒童。三樓是手術室，設備完全符合最嚴謹的衛生條例；著名的德國籍醫生如加爾·猶迪醫生（Dr Karl Justi），他是醫療主管，奧斯加·梅利醫生（Dr Oskar Muller）等，都在這兒施行手術。那時，醫院沒有固定的收費制度，病人各按自己的經濟能力及心意付錢，如此，富人的慷慨補償窮人的

不足。醫院旁附設藥房，每年約有二千名婦人及孩童來求診和取藥。

4. 走出灣仔

十九世紀末，聖童之家的容量達到了飽和點。雖經多次在海旁東（Praya East）填海地取得新增的空間，灣仔的活動範圍仍是過度擠迫繁忙。在那狹小的空間裡，容納了修院、初學院、孤兒院、育嬰院、課室、勞作室、為傷殘老弱人士的療養院、醫務室、醫院及藥房、還有一寄宿學校。

一份呈交沙爾德的報告，給我們描述了在二十世紀初，修女所從事的慈善工作種類的繁多。

聖童之家平均每天接收五至七名棄嬰——每年約有一千九百名，其中三至四名或更多在數天或數星期後逝世。英國政府給予小量的棺木及殯葬津貼。僥倖生還的嬰兒在聖童之家被撫養成人。今天，那兒約有三百九十個一至二十歲的……他們在育嬰院、勞作室，或在療養院、盲人及傷殘者的醫院等。在鄰近的醫院裡，有五十至六十名老婦人。現有一百八十八個身體健全的女子，在兩間勞作室工作，一些負責縫補，另一些製造通花花邊，她們售賣這些花邊以維持生計，年青及較年長的女子更為歐洲家庭縫製服裝。達到婚嫁年齡的，我們為他們安排婚嫁，對象多是來自中國內陸的男教友；不願結婚的，也就留守在聖童之家。另有兩所學校教授歐籍兒童，一為法文，一為英文。現共有九十五名學生，其中二十五名是寄宿生。有二百四十六名兒童（孤兒），他們每天上課兩至三小時，為此她們聘用兩名老師。⁸

* Emile Leguc, *Journal de la Communauté*, Vol. 1 in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Archives.

那細小的空間容納了那麼多的人，那麼多的活動及工作在同時進行，明顯地，增添空間是刻不容緩的事。數年後，已很擠迫的醫院更達到不能接受的地步。再者，一九〇四年電車開始行駛，所發出的巨大聲響，對醫院裡的病人實在構成騷擾；巴黎外方傳教會總務金神父（Fr Leon Robert）住院時，不勝其擾，催促修女遷移地方。

在灣仔找不到發展的空間，房舍兩邊被屋宇包圍，另兩邊則是街道和海水。天主的上智再次幫助她們解決了困難。一九〇二年，聖童之家爆發了一場霍亂疫症，促使政府認真注意菲力斯姆姆增加土地的訴求。巡視院舍之後，衛生局局長建議菲力斯姆姆須把兒童留在屋外，以防過度擠迫。對此，菲力斯姆姆反應激烈，向他說：「我已準備好蓋一所新房子，只要政府能給我一些土地……」。⁹

之後，事情進展迅速多了。督察官親自處理這事，修女的要求被提交至英國的國王。一九〇三年八月十七日，政府授予修女一塊在跑馬地的土地；四十年前，這片土地本是華人墳場。修女請來工人清理場地，把掘出的骨頭歸還家屬，進程卻非常緩慢。菲力斯姆姆的健康狀況不穩定，因此她未能全力處理此事。她感到非常疲倦，最後不得不與另一位同樣需要休息的修女，往上海稍作歇息。期間，跑馬地的工程繼續緩慢地進行；待至一九〇六年，面對黃泥涌道的石牆建成，才開始建造房舍。

終於在一九〇七年聖誕日，菲力斯姆姆以一隊列的車輛，把患病的嬰兒及長期病患者，送抵這所位於跑馬地、名為「加爾瓦

⁹ 同上註 Vol. 2。

略山」(Le Calvaire)的新居所。很多人提問：爲什麼要稱作加爾瓦略山？

這所房子爲我是加爾瓦略山，可能也是將來的好預兆，所以它以此爲名…。爲什麼害怕加爾瓦略山？我們的主基督不是說過，人必須經過苦難的磨練，才能進入光榮嗎？¹⁰

5. 新的服務中心

修女的工作由灣仔轉移至跑馬地，但噪音的問題仍未能解決，爲正身受病苦的人，那是極難忍受的。金神父再次提出要求，催迫修女把醫院遷往另一地方。至一九一四年，事情有了轉機；她們獲悉在銅鑼灣有一大棉紗廠——「香港棉紡織染公司」(Hong Kong Cotton-Spinning, Weaving and Dyeing Company)出售物業，包括土地及廠房。棉紗廠因不願面對劇烈的競爭，決定轉往上海經營。保祿·遮打爵士(Sir Paul Chater)在這龐大的計畫中，是修女慷慨的贊助人及「保護者」，他購入灣仔的物業，並幫助修女以一合理的價錢，獲得銅鑼灣的廠房。

修女搬遷至銅鑼灣，在那兒展開她們的服務，實是明智的決定，上主的安排。

這是一勇敢、甚而冒險的嘗試。在當時，銅鑼灣也可算是貼近市區，在市區內有電車行走，但在那遙遠的地區，卻沒有交通工具。香港棉紗廠附近只有很少的房屋，棉紗廠是那區內最大的一間了…。它的位置被描寫

¹⁰ Marie Paul Bord, *In China* (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, 1996), p.16.

為「處於跑馬場及銅鑼灣馬球場」之間。很少人認為那兒會發展成住宅區。¹¹

再者，它的周圍是沼澤地，瘴疾猖獗。

在獲得沙爾德的認可後，金神父被委託全權代理，他不單處理灣仔及銅鑼灣物業的買賣，更負責把棉紗廠改裝。他把殘舊的工廠轉變為一小城市，內有修院、孤兒院、學校及醫院。整個計畫需時三年，師主教稱之為「龐大的創舉事業」。

廠房的改裝及維修工程始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。待第一座建築物落成及獲得入住准許後，灣仔的歷史性遷移便立即開始。由修女照顧的孤兒人數眾多，他們首先獲被安置在最大的房舍內，那兒有兩個大的內庭院，可作遊樂場之用。一九一五年十月六日舉行賣物會，慶祝孤兒院喬遷之喜，獲港督梅軒利爵士（Sir Francis Henry May）的太太——梅海倫娜夫人（Lady Helena May）蒞臨祝賀。

翌年，銅鑼灣的學校也在翻新了的棉紗廠舉行開幕禮。港督梅軒利爵士在夫人及秘書的陪同下，在學校進口處舉行剪綵儀式。

最後遷離灣仔的是醫院。舊工廠工人宿舍的地盤需要大規模的重建，更需要大量的資金。菲力斯姆姆深感到這龐大工程的壓力。

她埋怨自己的衝動，沒有充足的資金而作出如此巨大的承擔…。她唯獨投靠天主及祂仁慈的眷顧，上主從不遺棄行事正直、尋求天國來臨的人。¹²

¹¹ Ryan, p.30.

¹² Bord, pp.23-24.

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，醫院由師主教祝聖，並沒有舉行其他儀式或開幕禮。在修女努力的耕耘下，醫院很快成為香港最優秀、設備最完善的醫院之一；修女辛勤的奉獻，獲得社會人士的讚揚。在《印度支那經濟復甦》（Economic Awakening of Indo-China）雜誌中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醫院：

該院駐有一英國籍醫生，為貧苦大眾服務，但該院的所有醫生都擁有行醫資格…。照料病人的工作則由八位法國修女及兩位中國修女主持，有四位由馬尼拉修會屬下學院畢業的護士…從旁協助。該醫院的手術室為香港最完善的手術室…。醫院還設有產科，分頭二等的病房，還有普通病房及置有新式設備的特別護理室，裡面有特別的雙摺床等…。

頭等病房除設有一張病床外，還有一張床，專供陪伴病人的親友用的…費用每天為七元。二等病房費用為四元至五元，房內的設備與頭等的大同小異，只是沒有那些豪華的設備而已，食物方面也比頭等病房較少選擇。三等病房設有四張病床…病房費用為一元五角。對於那些完全沒有能力支付藥費的病人，醫院免費為他們診治…。此外，還有一所特別的診症室，特別為貧苦的中國人而設，主診的醫生是年紀老邁的安娜修女（Sr Anna），她在香港行醫及推動慈善工作已有三十五年了。在貧苦大眾的心目中，她是香港最佳的醫生。¹³

金神父和菲力斯修女的心血及辛勞確實沒有白費。

¹³ Jean Vaudon, *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*, 《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一八四八年 - 一九二六年》，中譯本（香港：1980），頁 120-121。

人們通稱那所醫院為法國醫院，已成為遠東最優良、設備最先進的醫院之一。而寬敞的孤兒院也裝置了不同的設備，為所收容的可憐女孩子提供多類型的訓練。¹⁴

最初，在灣仔聖童之家的學校，包括中文、英文及法文三個部門，只算是修女多項工作的一部份，沒有特別的部門名稱。九一五年遷移至銅鑼灣時，修女給予一個新的名字，稱為「聖保祿機構」（St Paul's Institution）。稍後，於一九二〇年，學校才有自己的名字——「英法學校」（Anglo-French School）；戰後，改稱為「聖保祿學校」（French Convent School），一九五五年才把英文校名轉為「聖保祿學校」（St Paul's Convent School）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6. 歷史里程碑

一九六八年是修會在香港的一個里程碑。首批法國修女來港傳教一百二十年後，一位中國籍修女被委任為香港省會長，她是張佩瓊修女（Mother Marie Isabelle Tchang）。她原籍中國雲南省（Yunnan Province）昆明縣（Kunming），修會於一九一一至一九五一年曾有修女在那裡服務。張會長秉承貝克維會長推行慈善工作的原則和計畫。九龍藍田是一徙置區，很多新移民在那兒居住，他們的子女極需一所學校，為他們提供教育。一九七〇年，第三間聖保祿中學在藍田（Lam Tin）啓幕，被委任為校長的是一位剛由英國修業回港的年青修女——王德蘭修女（Sr Marie Pauline Wong），她更將會領導香港整個團體。

¹⁴ Ryan, p.15.

修女的宗徒工作一直是獨立的，不是由教區安排；這引來一些本地神職人員的意見，他們感覺修女在牧民工作上與教區的合作不足，當然，這並非事實，因為自六十年代始，修女便在大埔、堅尼地城、深水埗等地，默默地在堂區服務。可惜，十年後，聖召式微，暫願修女人數下降，在週末往堂區協助的工作也減少了。

一九八九年，當王德蘭修女被委任為省會長時，便面對這個困難。修女人數雖短缺，她仍讓有意服務堂區的修女，在堂區負起全職牧民的工作。這時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引起的影響，特別有關神職界及修道團體方面，逐漸浮現出來。一九六五年大公會議結束，隨後數年，很多天主教信徒都面對極大的危機；全球明顯聖召銳減，神職界及修道團體則出現還俗潮。

在香港，這股衰退的激流，更因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而變得複雜及惡化。自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，簽下「中英聯合聲明」（Sino-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）後，香港人便要面對未來的政治動向。自此，事情無論大小、私人性或社會性，都不免與一九九七回歸這問題扯上關係。社會受到極大的震盪，掀起前所未有的移民潮，移民數字高企，鄧小平（Deng Xiaoping）提出的「一國兩制」（One country, two systems）理念也阻遏不了。

教會內的改革及香港社會的不穩定，引來混亂不安的情緒，這可從修會聖召及修女數目不斷下降的情形顯現出來。由於加入初學院的人數萎縮，在上水的「聖保祿初學院」（St. Paul's Novitiate）也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關閉；五年後才在銅鑼灣重開。

聖召短缺打擊了修女的宗徒工作及傳教活動。因而被關閉的不單是修會的機構，會院團體也未能倖免；一些聖保祿機構的管理層也不能再由修女出任，改由在俗人士擔當。一九九六年，聖保祿醫院及聖德肋撒醫院的醫務總監工作，分別由方心讓爵士（Prof Sir Harry Fang）及周寶煌醫生（Dr Christina Chow）接管。方教授在傷殘復康界中享有盛名，是不遺餘力的先驅者；周寶煌醫生則活躍於香港明愛的工作。

不幸被削減的修會服務，包括了跑馬地的幼稚園部、商科部及銅鑼灣的商科部。銅鑼灣聖保祿學校及跑馬地聖保祿中學的商科部，為未能進入大學的中學畢業生提供高等教育，已有半世紀之久。這兩個享有盛名的商科部，培訓了數以千計能幹、備受讚賞的秘書及辦公室職員，有些更藉此而晉陞管理階層；這成功全賴姬瑪利·聖心修女的努力和功勞。

在各方面衰退的環境下，一個新的服務需求卻逆流誕生。一九九三年一月，聖保祿學校開辦了「澳州國際書院部」（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ection），取錄兩班第七班（Year 7）的學生，共約二十人。這是為幫助我們修會在澳洲摩士圍的「震旦書院」（Aurora College）栽培學生，修女在澳洲開辦了一所只有第十一及第十二班（Years 11-12）的高校。澳州國際部是為移居國外的澳洲籍學生，及準備移民澳洲的香港家庭子弟，故採取了澳洲中學第七至第十班的課程，教師有澳洲籍及華籍。一九九八年，校名改為「國際書院部」（International Section），課程也加以擴展，包括「國際中學文憑課程」（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, IGCSE），這是「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」（Cambridge University Board of Examinations）為中四及中五而設的兩年課程。

7. 回顧與展望

回顧修女在一九九八年的宗徒工作，發現修女人數雖減少，卻仍能在教育、醫療、社會福利及福傳等多個範圍服務市民。修女大部份的愛心工作集中在銅鑼灣，那兒有聖保祿學校的三個部門（小學、中學及國際部），兩所學前教育（聖保祿幼兒園及聖保祿幼稚園），聖保祿醫院及聖保祿女子宿舍（前身是孤兒院，現仍有十一位已高齡的孤兒）。在跑馬地有聖保祿中學及聖保祿天主教小學，在九龍有聖德肋撒醫院及護士學校、藍田聖保祿中學，在大埔則有「天主教聖保祿幼兒園」（St Paul's Catholic Day Nursery）等。修女們秉承基督的救贖使命，在學校、醫院裡臨在和延續服務，提昇人們的宗教熱忱，不單學生和病人受益，其他職務人員也裨益不淺。滿懷虔誠奉獻的心，她們忠信地培育首四位法國傳教修女在香港土壤所播下的愛德種子。

四位法國修女踏足「荒蕪」的香港一百五十年後，仍在香港的外籍傳教修女，只有一位法國及兩位菲律賓籍修女。魯瑪利·奧古斯修女（Sr Marie Auguste Roue）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抵港，在香港已有六十九年。她對傳教的熱誠，尤其對中國人的愛護，是她恆心堅忍的秘訣。她對首次參加的感恩聖祭，仍有濃烈的憧憬：

那天是獻聖母於主堂紀念日，我懷著極大的喜樂，這是一很清晰的標記，我將偕同聖母在香港奉獻我自己。…每天在舊的英法學校地下為會院團體奉獻感恩聖祭，銅鑼灣的所有修女在此參與聖祭；基督君王堂剛建成，還未能使用。我們人數眾多，頗擠迫，那時冷氣機仍未出現，這不就是我們全都願意接受的傳教生活嗎？包括一位剛抵步的修女，我們都很快樂！

一九九一年，八十八歲的魯修女接受了訪問，有趣地描述一些她在聖德肋撒醫院退休的生活片段。

每天早上八時，即使是星期天，我由一個病房走往另一病房，向每一位病人說：「早晨！」並向他們慰問，臉上掛著的是最美麗的笑容。有些日子，我常常抽空為他們做些微的服務，因為中國籍的病人…，多不願意為瑣碎的事而按鈴，雖然我已重覆地說那些鈴是為他們而設的。向我說口渴的人，我為他們送上水，有些則喜歡多一張毛毯，有些卻說棉被太重了…等等…等等。

對那些將要被送往手術室的信徒，…我邀請他們及焦慮的家人與我一同祈禱。若病人願意，我便為他們邀請一位神父或牧師到來。對心裡充滿煩憂的家人，我耐心地聆聽，分擔他們的憂慮，…帶他們往聖堂，…他們可隨意在那兒祈禱。¹⁵

醫院裡有待探訪的病人不下數百，魯修女每天都很多姿多采。

一九七〇年後仍繼續的工作，一九九八年更蓬勃起來。回顧整段悠長的歷史，成就中不免帶著不少的眼淚與辛酸。猶如聖保祿——她們的主保，修女們也經歷了嚴峻的考驗和痛苦：疾病、死亡、誤會、被驅逐的恐懼、破壞等。她們與香港一起，分沾香港的精神，從困難、障礙中站立起來，跨越挑戰。聖保祿的說話是她們最好的寫照：「若是天主偕同我們，誰能反對我們呢？」她們滿懷對天主引領的信賴，邁向未來。天主將指引她們追隨祂的旨意，延續培植先驅修女一百五十年前在香港土壤播種下的仁愛樹苗。

¹⁵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, *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*, No. 136, July 1991.

參考書目

1. Bord, Marie Paul. *In China*, trans.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. 1996.
2. Bord, Marie Paul. *Mothe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*, trans.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.
3. Cheung, Frederick. "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in Hong Ko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", *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*, Vol 23 (November 2007).
4. Clarke, NM. *The Governor's daughter takes the veil, Sister Aloysia Emily Bowring, Canossian Daughter of Charity*. Hong Kong: Canossian Missions Historic Archives, 1980.
5. Gauld, Robin and Derek Gould. *The Hong Kong health section, development and change*. Hong 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2002.
6. Gheddo, Piero. *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*. Hong Kong: Catholic Truth Society, 1992.
7. Gobillot, Rene. *The Sisters of Saint Paul of Chartres*, trans. Manila, 1956.
8. Granelli, A, "The Bumper Harvest", in *Catholic Hong Kong, A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ary Activity*. Hong Kong: Catholic Press Bureau, 1958.
9.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. "Minutes of the Meeting." 7 October 1909, <http://www.legco.gov.hk/1909/h091007.pdf>.
10.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. "Minutes of the Meeting." 3 December 1914, <http://www.legco.gov.hk/1914/h141203.pdf>.
11. Hong Kong Urban Council. *Education in Hong Kong, past and present*. Hong Kong: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, 1993.
12. Huard, Cecilyenne. *Give and Take*, No. 2, November 1968.
13. Le Pichon, Alain. *Bethanie and Nazareth -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*. Hong Kong: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, 2006.
14. Opper, Sylvia, "Comparison of certain structural and organisational features of Hong Kong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", <http://sunzi.lib.hku.hk/hkjo/view/36/3600007.pdf>

15. Pearson, Emma and Nirmala Rao, "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in Hong Kong: challenges in effecting change in practices", Cnet Networks, http://findarticles.com/p/articles/mi_qa3614/is_200601/ai_n17174789
16. Reuter, James B. *For the young at heart: highli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*. Manila. 1965.
17. Ryan, Thomas F. *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*. Hong Kong: Catholic Truth Society, 1959.
18. Santinon, Narciso. "30 years." *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*, No. 143, June 1992.
19. Santos, Josefina. "An interview." *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*, No. 139, October 1991.
20. Santos, Josefina. "MBE honour." *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*, No 182, February 1997.
21.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. *Hong Kong: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*. Chateaudun: Societe Francaise de Phototypie, 1910.
22.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(From the notes of Louis David). *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*, trans. 1986.
23. Smith, Carl T. *A sense of history*. Hong Kong: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, 1995.
24. Ticozzi, Sergio. *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*. Hong Kong: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, 1997.
25. Vaudon, Jean. *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*, trans. Hong Kong: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, 1979.